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联系的嬗变、断裂与建构 ——对沿海某发达县级市的社会学观察与分析

王春光,刘雨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 100732)

[摘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经济总量快速增大,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非意味社会问题减少、人民更加安居乐业。本文通过对沿海某发达县级市社会的田野观察和调查,从社会联系的嬗变、断裂和建构中看到社会发展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潜伏着许多社会危机和问题。克服危机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以培植社会多元参与机制为重点,推进社会合作,重构社会联系,涵养社会资本的社会建设。这对于思考中国整体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社会联系;公平原则;传统乡土社会;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王春光(1964—),男,浙江省永嘉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流动和分层、移民与流动人口研究。

刘雨龙(1988—),女,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主攻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1-0150-09 [收稿日期]2015-10-05

无论阶层结构还是城乡结构,都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它们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性的,需要通过一些中观的层面,比如社区、组织、单位、团体等等。换句话说,通过这些中观层面的载体,才能显现个体与宏观结构、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而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就是由这样的各种社会联系构成的,一个社会的变化最直接地体现在这些社会联系的变化上,反过来,社会联系的变化会引发一个社会的宏观变迁。在韦伯和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组织原则的不同:传统社会更多的是采用特殊性、先赋性等原则组织起来,而现代社会则是通过普遍性、获致性原则组织起来的^[1]。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机械团结社会,即通过一定的社会情感联系起来,而现代社会则是有机团结社会,即通过劳动分工、功能互赖的原则联系起来的^[2]。虽然这些看法并不一定为后来的所有社会学家所接受,但至少表明社会联

系的不同反映了社会形态的差异,社会现代化就是通过社会联系的变化而得以体现的。因此,开展社会联系变化的分析和观察,对于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

(一) 研究问题

当代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通常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形态,这只是宏观的一种认识。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接着要问的是,这种社会转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微观和中观上又是如何表现呢?有的从社会阶层、社会流动角度去研究^①;有的从社会结构上去研究^[3];有的从人口、家庭、性别、社区、村落等角度去研究^②等等。有的研究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4];有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碎片化^[5];有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出现断裂、失衡^[6];有的研究认为,从1990年

①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唐灿《中国社会城乡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王颖《基层社会的重塑:以新社区为基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吴小英《市场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率在下降^[7]等等。这些研究实质上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社会联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原来的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到现在的“十大阶层”那么社会联系是什么样的变化?简单的推理可能会是复杂化,但在这复杂化中,是否有的阶层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了呢?是否会出现孙立平所说的那种“断裂”呢?这种断裂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按李强的观点,中国社会出现碎片化,那么碎片化后的社会联系与之前又有何不同呢?是社会联系的变化造成碎片化,还是碎片化导致社会联系的变化呢?如果按孙立平的断裂看法,那么社会“断裂”在社会联系上又是怎样的表现呢?所以,本文试图从社会联系角度去把握当前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我们所调查的是中国沿海一个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某发达县级市。在该市,观察到社会的阶层分化、“断裂”乃至社会的“碎片化”,因此它是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联系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场域和平台,具有以小见大的特性。

(二) 研究视角

所谓“社会联系”是指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链接形式,表现为以一定方式呈现出来的关系形态,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组织关系、家族关系、上下级关系、族群关系、职业关系、感情关系等等。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是以有机联系(团结)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机械联系(团结);滕尼斯则认为,传统社会限于社区联系,注重于地域性的情感和认同,而现代社会则表现为松散的、超地域、非情感性、理性化的社会联系^[8]。政治学家戴维·米勒则认为,当今社会有三种社会联系:第一种是团结的社群,存在于“人们共享民族认同之时……首先是人们之间产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面对面的关系,扩展到更大的圈子,这一圈子中的人们既是由亲戚关系或相互熟识,也是由共同的信仰或文化联系在一起的”^{[9] [P32]}。第二种是工具性的联合,以功利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经济关系就是典范。第三种是公民身份的联合体,即大家在国家层面都是公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公民身份可以被看作是抵制市场经济所产生并使其合法化的不平等的一种地位”^{[9] [P37]}。虽然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联系变迁,同样发生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现代化进程中,但是中国的社会情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不仅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关系,而且还存在着计划与市场的现象。上面提到的那些理论仅限于传统与现代这一维度,对中国而言,还需要增加从总体社会向市场社会和行政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维度^[10]。社会联系在这两个维度上都会发生变化。本文拟从以上两个

维度考察某县级市的社会联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及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二、社会联系的嬗变

虽不能说该市的传统社会联系与全国完全同构,但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脱离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共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门见山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乡土性表现为:不流动是常态,流动是非常态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就像植物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因此彼此是相当熟悉的,是熟人社会^[11]。

用费孝通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在该市还能找到相似的传统社会联系。在我们调查中,一些该市居民反复告诉我们说,长期以来他们不愿意离开当地,觉得天下这里是全国最好的地方,原因在于该市人少地多,没有大的灾害,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

在1990年代初,该市县城区还很小,只有一条1公里长的道路,全市45万人口中只有2万人居住在城关镇,其他乡镇都是小镇。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它们是“村之头、城之尾”,所以那时的该市并未像现在那样是一个城市化水平很高的社会,而是属于乡村社会或“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社会联系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村落为依托,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原则构建成的链接形式。“一个村子建筑都是星星点点,没有明显界限。北方的村庄一家和一家之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前一家在屋里子说话,后一家人都能听见,人与人关系比较紧密。这里就不是这样,农村到处都是田,这里一个房子,那里一个房子,不是很紧密。文化表现在居住空间上,可能与自然环境和文化意识有关系,相对比较分散。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里的人对房屋的格局特别看重,房子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昆山、常熟都是聚居的,这里的人造房子,要在同一条线上,不能比我前一点,也不能比我高一点,不然要坏了我的风水,这个东西讲究得不得了。现在并村之后集聚在一起,但这是行政推动的。我们市村落自然的状态是星罗棋布的,成行的高矮前后也要规定的,不需要干部去管的。”(市志办主任访谈)该市的传统村落虽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聚集,成散点分布,但是其自身也有一定的联系和组织规则,比如并排的房子不能有高有矮。按该市志办主任的话说,是有“规定的,不需要干部去管”。也就是说,其组织和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不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就可以解决内部出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内部的社会联系方式和原则就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比如共同的风俗理念、邻里调节规则等。“年初一到庙里烧香,有个很大的庙,以前每个村里有个小

庙 年初三、六、九要端饭,老人给小孩,孩子给老人。端饭:蛋(滚过)、穿条鱼(穿过)、鸟(飞过)、鸡(飞过)、猪蹄帕(走过)、鸭子(游过)。9是必须要带的。6开头的也是必须要带的。舞龙灯现在很少了,双凤是舞龙之乡,现在很多。以前种田的时候,要从田里铲土回家里,大丰收。年初一、初二点蜡烛。放鞭炮。腊月二十四送灶,年初一接灶。去世,做道场、念经,四到五个小时,可能做好几场。”(某社区书记的访谈)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对该市的传统社会联系有这样的认识:村落比较松散,人际关系不那么紧密,但有一套自我调节的运行规则,沿用的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指出的那些原则:差序格局、无讼、家族、地缘、男女有别、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礼治秩序等。我们虽然不能用一个现代的标准对这些社会联系进行对错、是非、合理与否等判断,但至少可以说,这些社会联系构成了该市的传统社会形态:一个自治、长幼有序、仁义礼智信、感情亲密的社会。

当然,传统的社会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跟现在相比,只是变化十分缓慢而已。自从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商品、思想观念的涌入,传统的社会联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11] [P1-4]}他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已经意识到工业下乡、外国商品对当时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当时农村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乡村手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和放弃手工业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前者面临的困难就是技术改进和社会再组织,但是农民基本上不具备这些条件,只好选择放弃。这意味着早在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联系已经受到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冲击,费孝通研究的场所就在该市的邻近“江村”,为我们考察该市当代社会联系的变迁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参照标本。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血缘、地缘链接在一起的熟人社会,家庭、家族和邻里在传统社会联系中具有核心的纽带角色。费孝通也看到这样的格局在1930年代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沿着他的思路进行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包括该市)上,社会联系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一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开始主导社会联系,其中当然有强化家族、家庭的纽带

角色,也有基于功利原则而产生的一种投机性的社会联系。美国学者杜赞奇对民国时期华北的村落精英类型研究即揭示了这一点^[12]。二是中共执政后国家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对村庄的控制和管理,国家建构了一种新的村社制度,即人民公社制度,对社会联系的影响也相当大:家族、家庭的纽带作用被削弱,甚至边缘化了,村社成为社会联系的核心。在这样的社会联系中,政治、权力原则取代了血缘原则,构筑了以政治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分配机制。三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联系出现的原子化变迁趋势: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的作用在扩大,国家从农村撤退,村社制度难以为继,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问题;后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国家和村社也趋于功利化、势利化,甚至出现与民争利的问题(如乱收税费、撤村并村和征地拆迁、生态污染等),利益原则取代政治原则而成为社会联系的主要规则,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社会合作则不被重视。或者说,人们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角度去考虑社会合作,原来那种把合作作为目的的做法和想法越来越少,社会联系的原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那么该市的社会联系是否沿着这样的变迁轨迹进行呢?或者说,我们是否从该市那里更具体地找到中国社会联系变迁的轨迹呢?在整个国家的背景之下,该市显然无法避开整体的社会变迁大势,但它在社会联系上表现出一定的地方性。该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上海周围。从20世纪初,一方面国家权力深入到那里,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和城市商业文明已经影响到那里的社会,因此,那里出现了江村在1930年代曾出现的社会变迁状态——“生活方式流变和社会再组织”问题。那里的人开始去周围的常熟和上海等地经商或做工,但相对于苏南其他地区,该市耕地较多,更多的人安于农耕生活,因此该市的社会联系更偏于乡土特色。毋庸置疑的是,国家权力的影响已经开始使原来的社会联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乡绅与官僚成为当地社会两个最有影响的群体,并与传统社会联系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某些社会联系的传统特性,如乡绅借助于国家权力而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力。相比解放前,1949年后的社会联系受到了国家的彻底改造和重构,产生了与传统社会联系具有明显差别和特点的新的社会联系:以村社为载体的集体社会联系渐渐地扎根于当地社会,而将传统社会联系排挤到边缘地带。

该市社会联系的集体性与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不同的一点在于,1960年代后期出现的社队企业的影响。社队企业通过以下几方面增加村社福利,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联系的集体性:首先,解决了村社农业经济发展

中诸如生产资料短缺等问题;其次,增加了社员的就业机会;第三,增强集体福利,提高社员的集体荣誉感和认同。所以直到现在,该市居民的集体意识仍比其他地方强烈。当地社会联系的集体性,表现为利用集体福利以增强居民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和认同,反过来却削弱了居民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乐于集体为自己提供生活安全保障,而怠于通过个人创业来实现致富,这表现在当地当私营老板和个体户的人较少、当工人的比较多这一点上。因此,该市社会联系的集体性具有强化村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中的主宰功能,使个体严重地依附于村社,拟制了家族以及其他自主组织的社会联系功能。该市的各级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一直有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情结。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镇企业改制、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和快速的行政主导型城市化进程等社会事件,对社会联系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联系的集体性,驱使社会联系向原子化方向变迁。正如前面指出的,在社队和乡镇企业时代,家庭、家族和宗祠等传统的社会联系被边缘化及削弱,当社会联系的集体性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而弱化,家庭、家族又不能担当起社会联系的合作性替代功能。乡镇企业改制的普遍做法是将企业完全卖给个人,甚至不少企业是送给某些个人,村民与企业从原有的合作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不再具有共有意识,不少村民原为企业工人,转制后失去了工作,由此不少村民感到失去集体庇护,而陷入孤立无援和无助状态。

进入21世纪,为了推进城市化、招商引资、土地开发,撤村并村、上楼居住,进一步冲击了村民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特别是在一个合并后的村庄或社区中,村民与周围新邻居缺乏长期的生活和交往经历,因此,一时难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使他们产生了一定的不安全感,也出现许多不满情绪。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当地社会联系的原子化变迁:按当地人自己的说法,他们不愿多生孩子,因为多生孩子经济负担重,他们经济条件还不错,老了也不需要指望子女养老。所以,该市计划生育工作比较好开展,较早地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现象,老龄化已达20%以上。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一方面比父辈更加推崇行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维持家庭联系的社会责任。当然,他们也能从家庭联系中获得支持和好处,所以他们婚后只好采取了变相的办法——“两头住”,在双方父母家都有他们的房子,每周轮流住,女的不叫出嫁,男的不叫入赘。但这样的社会联系确实有点“强弩之末”的态势。

社会联系的原子化呈现出这样的轨迹:一方面是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对原来的以地缘、血缘等传统原则构建的社会联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在当代社会,社会联系更多的是以个体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家族乃至集体为单位组织而成,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现象;另一方面以集体为核心或主轴的社会联系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出现明显的解构,而在集体化时代被边缘化的家庭因计划生育而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和凝聚能力。人们发现,集体已经丧失了以前的庇护功能,家庭也越来越单薄,因此社会联系显得越来越原子化、个体化。尽管当地政府正在努力通过重新发展集体经济、增加集体福利供给,试图强化集体的庇护能力,但仍难以化解社会联系的原子化问题。其原因在于,在原子化过程中村民吸取了集体不可靠的教训以及市场化场景下个体利益凸显,因此,很难让他们像过去那样去相信一个集体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生活安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地的社会联系就没有重构的可能,当前当地社会联系只是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但并没有彻底原子化,这为社会联系的重构留下了社会空间和路径。

三、社会联系嬗变路径

任何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社会联系的解构和重构问题。该市也不例外,只是每个社会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而已。该市面临的社会联系问题就是上面指出的原子化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传统劳动到现代专职化就业转变中的社会联系问题;二是从集体归属到社区归属转变中的社会联系问题;三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转变中的社会联系问题。

(一) 专职化就业转变中的社会联系问题

这里以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所描述的江村职业情况为蓝本,来观察、分析传统社会的职业与社会联系问题。费孝通在江村观察到,1930年代,江村的职业分工并不明显,专业化程度很低,其中农业是最基本职业,近80%的家庭从事农业,有的人从事农业的同时还会利用空闲时间去做手工业,进丝厂打工,有的人在打工之余还下地干农活;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可以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种地的,有做手工的和从事服务业的(江村占7%的家庭从事手工和服务业,但许多也是兼职的),有到厂里干活的,等等。每个家庭以家长的职业为主,所以费孝通以家长从事的职业来对江村的职业进行分类。在这样的劳动中,职业分工并不很明显,专职化和专业化程度也不高。村民之所以参加劳动,

一方面是维持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寄托着其人生意义及价值,具有很强的价值理性,不像现代社会,就业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表达。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联系主要是通过劳动得以建构和维持的,比如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依赖于亲属、亲戚、师徒这样传统的社会联系,不同地域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地缘影响了人们的职业关系,如只有那些住在湖边的人才能捕鱼等^[13]。当然,费孝通在江村进行田野调查的那个年代,江村的职业已开始出现现代分化,专业化程度在提高,已经有外来人口来江村从事商业服务业,城镇的商业和服务业已经带动江村的职业变迁,特别是影响到江村的手工业和商铺,对此构成了新的挑战。江村的这种职业现代化变迁,后来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而中断,但是预示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种趋势,在后来的1980年代改革开放中得以延续,这也与该市的社会变迁处于同步轨道上。

对该市农民来说,从传统的农业劳动,转向现代的专职化就业,并不是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早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已参与社队企业劳动,但在社队企业的劳动在性质上与农业劳动并没有什么差别,尤其在分配上,一开始他们仍是作为社队成员与农业劳动者一起获得工分和报酬,这种状况显示的不仅仅是能赚多少钱,而是他们在社队成员中的地位与关系。在这个时期,人们的劳动(农业劳动及在企业做工)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以村社为核心纽带形成的社会联系集体性的呈现。进入乡镇企业时代,虽然社会联系的集体性并未弱化,但是就业显现出专职化特征:在不同就业岗位,不仅拥有不同的职权,而且享受不同报酬;科层化、工具理性在职业关系中渐渐地取代了村社的共同体身份和价值归属;由此,职业成了社会地位分化和不平等的基础。正如米勒指出的,在这个领域,应得原则成为社会联系的公平原则。但事实上,乡镇企业依然是社队集体属性的,拥有共同体的亲密关系,在资源配置上并不一定按应得原则进行,可能还潜伏着许多亲情、血缘、地缘等亲密联合的关系,因此就产生了应得原则与需求原则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乡镇企业的运行。这是乡镇企业在社会联系转型建构中面临的困境,也因为这种困境而终于在1990年代不得不进行转制乃至解体。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该市居民(尤其是村民)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实现就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非农就业,农业就业人数越来越少,一方面是耕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农业越来越难以与工业和商业竞争。市场化就业和非农化就业并不一定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而是为外力所迫所作出的无奈之举。不管如何,这种就

业与以前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专职化。人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兼职,或者很少有时间兼职。二,准时性。每天上下班都是有固定时间所规定。三,分工化。每个就业者只负责某个生产环节的一个工序,不像农业那样一个人能完成所有生产环节。四,不稳定性。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工作。五,雇佣性。就业者就是被花钱买去从事生产的工具。专职化就业确实履行了米勒所说的应得原则,但却失去了劳动的文化价值,比如对劳动的热爱,从劳动中体现个人理想等。因此,他们对待彼此,更多的首先是用工具理性去衡量,不容易培育亲密的社会联系。该市本地人的好处是在当地就业,专职化、市场化过程中还可以依托村落传统社会联系来弥补专职化带来的社会联系工具化问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感受到市场化就业对他们生活以及原有社会联系的影响,“村民‘村改居’后就业,基本上是自己,政府不安排。45岁以上的,搞物业的最多,保洁、保安、绿化养护,社区里,工业园里的,都是村里的老百姓,占60%~70%,收入不高,1200—1500元之间。现在找不到工人,就业很容易,连洗车的都找不到。40岁以下,年纪轻的基本上进工厂打工,进外资、德资企业比较多,年轻的白领,都是1万多元。”(对一个村支书的访谈)“原来都是种地的,不到家里串门的,就是到人家屋檐下坐坐聊聊天,到人家地里聊几句,不到人家家里一直坐着的。再说农活也忙啊,没多少时间闲着。打麻将我不喜欢,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的。现在不种地了,闲下来了,就是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聊聊天,看看孩子,打打毛衣。不过也没多少闲的,像我这个年纪都是出去打工的,赚一点苦钱。原来种地辛苦,但是自由的,现在嘛,没那么累,但是不自由了。”(对一个上年纪村民的访谈)从这里可以看出,非农化和专职化就业,一方面给了原来的村民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尤其是与其他村民交往的行动,由此感到与邻里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

(二) 从集体归属到社区归属转变中的社会联系问题

在集体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与社会的连接是通过集体这个环节实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集体中所处的位置和状态,也就决定了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身份。集体一方面强有力地控制着个人,另一方面也给予了个人社会稳定感和明确的归属,这是一种控制与庇护的集体性社会联系。但经过乡镇企业改制、就业市场化、撤村并村等,集体既不能像以前那样控制人们,同时也没有了庇护的能力,因此集体归属感渐渐地淡化,于是人们转而寻找社区归属。按滕尼斯最初提

出的设想 社区是一个具有亲密交往、感情归属、强认同的生活区域,但是,现在各地搞的社区建设,就是要将农村村委会改为城镇居委会、农村村落变成城镇社区,实际上走的路径根本不是像滕尼斯所说的回归到传统的亲密生活状态。该市也是这样去进行社区建设的,这里仅仅从对社会联系的影响上去看社区建设是否能有效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联系建构。

该市按照城市社区模式去搞农村社区建设,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撤村并村上楼,集中居住,扩大规模;二是强化行政科层管理;三是就业非农化。中国的村落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形态,大多是因为历史上的生产、地理、生活需求而自发形成的,在人民公社时代,虽然经历了行政的归并,自然村落与行政村还是并存的,许多行政村与自然村是一致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撤村并村速度快、势头猛,大大地削弱了原来村落的自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向农村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行政村的“行政功能”,呈现“行政化”,在原来的村落中衍生出两个层面的关系:一个是行政管理中的村落,另一个是自治的村落,前者往往不断地侵蚀后者的功能,由此产生社会联系的紧张和冲突。就业的非农化将原来的生活和劳动合一的场域转变为两者分离的场域,也就是说,原来村落中劳动与生活是不分离的,劳动实际上是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人们在劳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和感情与生活密不可分。但在非农化就业中形成的关系并不一定与生活直接相关,由此生活的联系则因为时间投入少、交往少以及就业工具化等因素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紧密和丰富了。因此,在这三种趋势中,不仅是集体时代的社会联系集体性还是传统时代的社会亲密性,不但未获得强化,反而被不断弱化,社区共同体面临疏远和解构的危险。显然,当前所谓的社区建设并不是真的在恢复和提升滕尼斯所谓的社区公共性及认同感,就像米勒所认为的,社区应该是亲密的联合体,是按照需求原则运行的,显然,目前的状态并不合乎这样的要求。

(三)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社会转变中的社会联系问题

在社会现代化理论看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变的过程。从上面两个维度我们看到,该市社会在就业和社区上的变化,已经显现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趋势。以下拟从另外维度对此作进一步分析并讨论其对社会联系的影响。

外来人口进入、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以及生活与

就业的分离都是促使熟人社会变成陌生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该市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数量接近户籍人口数量,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已经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的调查显示,在务工人员和服务业人员中,外来人口占很大的比例,部分外来人口进入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行列,该市的经济发展显然已经离不开他们的贡献。但是,他们在该市还是处于另一个世界:还没有转化为真正的市民;基本上是租房子居住,或者居住在企业为其提供的宿舍;不少外来人口处于灵活就业状态,因此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他们的子女虽然在政策名义上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服务,但因其父母就业的不稳定性而不能稳定地在当地接受教育。外来人口会按照流出地的不同而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聚居区。在这些聚居区内,外来人口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网络和行为规则,那是本地人无法进入、也不敢进入的。当地人说,他们害怕外地人,而不是外地人害怕他们。同样,一些外地人认为,他们在那里可以很牛气,弄不好就走人,当地人拿他们没有办法。跟其他有大量流动人口的地方相似,在该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形成鲜明不同的两大社会群体,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社会隔阂、不理解乃至歧视、排斥等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外来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彼此之间也处于陌生人状态,只能各自以老乡关系来组织他们在该市的生活和行动。

同样,该市本地农村居民从原来世代为农,而转变为以市场为取向的非农就业,难以在就业过程中形成稳定的熟人关系;与此同时,城市化将他们推向不断更新、高度流动、邻里交往困难的城市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当地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不再是过去那样一辈子生活的地方都是非常熟悉的人和事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群体就没有自己的熟人圈,但是这个熟人圈与大的社会相比是一个很小人际范围。与此同时,它还不是在相邻的居住范围中,不能消除人们生活周围的陌生感受和关系。

在陌生社会中,自然也有一些社会联系维持着人们的关系和社会运行,比如职业关系、法律规则、政府管理等。与此同时,处在陌生状态的人们有着更好的隐私空间以及更多的自由选择,而在熟人社会中,人的隐私性很差,会受到各种舆论、习俗和道德规范的限制。但是,陌生人之间在行为上缺乏确定性和信任感,社会联系出现断裂,更谈不上情感上的交流和依托,彼此始终存在一种怀疑,对他人的事、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往往抱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这很不利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或者说这构成了对社会凝聚、团结、和谐的挑战。

四、多元参与的社会联系建构

在从传统劳动到专职化就业、从集体归属到社区归属、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中,社会联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更加多样,社会更加异质化,表现为阶层分化、群体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价值分化、组织分化等,意味着社会联系不再是像过去传统社会那么简单的了;另一方面是一些新的社会部分之间失去了有效的联系原则和方式,甚至出现断裂和冲突。这两方面的变化给社会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换句话说,社会建设或者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急迫任务就是建构有效的、合理的、公平的、有凝聚力的社会新联系。

(一) 新社会联系建构的目标和内容

该市社会现代化在社会联系层面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社会凝聚力或者说社会团结和融合问题;二是社会参与、合作和支持问题;三是社会安全和幸福问题。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靠什么样的社会联系才能实现社会团结、社会融合、社会参与、社会支持、社会安全和社会幸福,从而化解社会“原子化”问题。迄今为止,已有各种理论试图来回应这个问题,如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韦伯的理性化和科层化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各种社会正义理论、公共治理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能给人以启发。比如,涂尔干认为在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明显的现代社会,组建职业联合体是化解社会整合危机的有效的社会联系重构方式;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发展公民社会,可以有效抵御市场、国家的侵害,实现社会、国家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和相互支持的社会联系;社会正义理论则主张,社会正义才是构建良好社会联系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在不同的变迁场域去解释和讨论社会联系何以建构问题,而过去三十多年该市的社会变迁是多重叠加在一起的,呈现不同场域,由此出现的社会联系问题也是多样的,不是上述一种理论所能解释的。

该市社会变迁的多重场域,表现为社会劳动分工和城市化加快、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社会分层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自由空间不断扩大等。当地的社会融合、社会团结或社会凝聚力涉及到外来人口在本地的融入、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一体化等内容,首先要解决的是制度性社会联系问题,那就是给所有在该市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以平等的市民权利,也就是通过米勒所说的平等这一社会正义原则去破解彼此之间

的制度性分割和排斥。平等的市民权利仅仅是建构良好社会联系的最基本条件。另一种社会联系就是不同人群、阶层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问题,因为随着社会分工扩大和多样化、社会地位的分化,社会歧视就不可避免产生;城市化带来的陌生社会形态进一步加深了人群之间的隔阂。如果没有一定的沟通和合作机制,社会歧视和社会隔阂就难以消除,社会会更加断裂。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和社区理论原则才能找到社会联系建构的方向及路径。

在社会联系建构中,如何重新挖掘适应现代化变迁又能协调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紧张问题的传统社会联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和思路。在该市的三大转变(从传统劳动向专职化就业、从集体归属到社区归属、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的社会联系并没有完全丢失、废弃或者失效。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它在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需要建构一些新的社会联系,但是往往一些新的社会联系没有建构出来,因此,社会就有可能处于碎片化、缺乏信任的状态。在建构新的社会联系过程中,嫁接、挖掘传统的社会联系,并赋予新的含义和机制,也许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总之,该市社会联系建构的目标是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更加多样性的背景下以增强社会融合和凝聚力,提升社会合作和参与水平,使社会成员有效地抵御现代社会风险,增强社会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由于该市社会变迁的叠加性和多场域特点,社会联系的建构并不是单一原则的,而是多原则的,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展开,具有丰富性和艰巨性。

(二) 社会联系的建构实践

在社会变迁中人们对社会联系的丢失和断裂,并不是被动的,往往会作出一些主动的应对和反应,这就构成了社会联系建构的实践内容。但是,由于人群的分化尤其是阶层化,他们在社会联系建构上的实践很有可能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甚至相互冲突的,从而会抵消这种建构实践的效果。正如在上面所指出的,该市目前面临的关键性社会联系问题是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的缺失问题。当地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社会联系建构上做了不少努力。

1. 逐渐构筑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市民制度,消除制度性歧视、创造平等机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等。具体内容有:建立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外来人口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将外来打工子弟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等等。当然这样一个制度还在建构之中,尚未完成,目前

还有不少障碍,也就是意味着基础性的社会联系还不健全,还存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制度性歧视和障碍。

2. 通过“政社互动”,促进社区建设,增强社区自主、自治能力。“政社互动”试图解决社区行政化问题,让社区回归到真正的自治状态。社区行政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自治能力弱化,社区没有精力从事自治工作,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和动力在减弱,尤其是中青年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兴趣不高。“政社互动”的思路合乎社会联系建构之要求,但在实践上却受制于其他管理体制而难以有效地促使社区“去行政化”。目前这样的结构性问题还在困扰着社会联系建构。

3. 实施“三社联动”,以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能力。虽然“三社联动”是与“政社互动”同时展开的,但前者偏重于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后者旨在促进社区自治。从广义上理解,社区也是一类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的设想是通过政府投入,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促进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与社区三者良性互动,实现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和社会自我发展等目标。但问题在于,社会组织弱小,发展的制度门槛过高、资源缺乏、制度空间狭小等,因此,至今仍未形成广泛的“三社联动”效应。

4. 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增强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效用。社会治理创新是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地政府都在宣称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做法五花八门。从理论上讲,该市的“政社互动”、“三社联动”属于社会治理创新范畴。除此之外,该市社会治理创新从机制到具体行动上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该市在社会治理创新上尚缺乏明确的目标、清晰的路径和强有力的实施措施。

除了政府而努力建构新的社会联系之外,社会自身也有一些行动,比如该市的义工联合会就是社会自我建构社会联系的最有示范效应的做法。不过,诸如义工联合会这样的社会组织行动实不多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该市的社会联系建构中,政府在唱独角戏,社会参与和合作依然很弱小,所以,政府很难通过社会联系建构将不同人群凝聚起来,提高社会共同体水平。

(三) 社会联系建构中的多元参与模式

仅仅靠政府一家去建构新的社会联系、修补社会联系裂痕、重塑传统社会联系,是不足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在于:首先,政府对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新的社会联系并不是完全清楚和明白的;其次,有些社会联系之所以失效和断裂,背后往往有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再者,即使政府明白需要什么样的新的社会联系,其作为

并不一定获得其他社会主体的认可,而且其自身的结构性障碍会削弱其努力,甚至可能走向相反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政府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它不能垄断社会联系建构角色,更不应禁止或过多限制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实现多元参与,才是有效建构社会联系的唯一出路。

在多元参与模式中,政府角色须作调整和重塑,应与其他社会主体形成平等合作伙伴,建立社会联系建构协同合作机制,即政府合理的角色是在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合作、互动中获得的。就该市而言,政府在建构社会联系中至少需要担当这样的角色:第一,改革和消除新社会联系建构的制度障碍,构建一套平等的社会联系建构体制,比如消除市民制度中有关城乡、外来人与本地人、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的基本隔阂,户籍身份隔阂、职业身份隔阂等。第二,为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联系建构,创造社会空间,提供激励元素,比如降低和消除社会组织发展的门槛,用财政资源购买公共服务和公益活动,在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上激活人们参与社会合作、互动和交往的动力及意愿。第三,规范和监督其他社会主体的社会联系建构行为,尤其对企业参与社会联系的建构,一方面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奖励,另一方面也要给予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压力,促使它们积极参与建构合理的社会联系。

至此,人们不禁会问,其他社会主体是指什么呢?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是重要的社会联系建构主体。在社区层面,老年居民之间的合作、联系和公共参与相对比较好。在一些社区,老年人通过唱歌跳舞和健身活动,形成了亲密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但社区对中青年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及凝聚力并不是很大,尤其是社区居委会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忙于履行政府交办的事务,而缺乏动力和精力去吸引中青年居民,更没有把外来人口作为社区居民对待,仅仅作为社会控制对象进行管理。

相对来说,企业在建构社会联系上更不积极,大多数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基本上未考虑帮助员工如何建立稳定的社会生存基础,尤其是与周围社会的稳定联系。问题最大的是外来务工者,他们缺乏与周围社会稳定的社会联系,企业在这里面也起到一定推波助澜作用,因为企业不能为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就业,也没有通过一些行动、政策和资源去建构外来人口群体与当地社会的联系。

在社区行动狭隘化、企业专注于自身的经济效益、政府行政效率和效用有限的情况下,在理论上社会组织在社会现代化快速变迁中具有很强的建构新社会联系、修补社会联系断裂、重塑传统社会联系的功能。正

如上面指出的,该市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现有的许多社会组织被纳入到行政管理体制内,官僚化、行政化相当严重,在组织和联系社会上缺乏有效的办法、机制和公信力。

五、简单结论

某市是一个县级市,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工业,迄今农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3%左右,近十年内有一半村庄被城市化或者撤并,外来人口数量与本地人口相当。由此可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该市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自然反映到社会联系变迁上。从这个市的社会变迁中,我们看到社会联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和重构,但解构快于重构,于是出现断裂、碎片化,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发展和进步,也影响到经济发展。虽然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设想、口号,在制度上作出一些改革安排,在资源上也有相应的配置,但是目前有多种反力牵扯着这样的建构:总体性社会体制制约了社会多元参与建构,市场化的负面机制未得到有效扼制,社会能力发育不良,社会多样性和异质性没有有效的整合机制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合作、互信和参与的新社会联系难以建构,社会还在向着原子化的方向滑落,这是当前中国基层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从高速逐渐趋向中低速的当下,如果不重视社会联系的重构,那么中国或将面临长期的社

会合作不足、诚信阙如、安全感差和幸福水平低等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 [1]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2]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3]孙立平.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J]. 南京社会科学,2009(5).
- [4]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5]李强. 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到“碎片化”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30年与我国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J]. 新视野,2008(5).
- [6]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7]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8]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戴维·米勒. 正义原则[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10]王春光. 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J]. 社会学研究,2013(3).
- [11]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12]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 [13]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The Gradual Changes ,Frac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Grass – root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 s Modernization Drive ——A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ome Developed County in Coastal Areas

WANG Chun – guang LIU Yu – l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in various sides ,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 urbanization and so on , which does not mean a happy life. This paper uses field study to investigate some developed county in coastal areas and finds out some social crises and problems. To solve them , we must have soci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s the key point , promote social cooperation , reconstruct social connections and conserv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 which is very significant to think about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China ’ s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connection; principle of fairness;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

[责任编辑、校对:冯金忠]